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BEYOND EAST AND WEST

Peter J.

Katzenstein
Edited by

中国化与中国崛起

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

[美] 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

魏玲 韩志立 吴晓萍——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中国化与中国崛起

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

[美] 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

魏玲 韩志立 吴晓萍——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美)

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主编;魏

玲,韩志立,吴晓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书名原文: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ISBN 978-7-208-15142-0

I. ①中… II. ①彼… ②魏… ③韩… ④吴…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9239 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

[美]彼得·J.卡赞斯坦 主编

魏 玲 韩志立 吴晓萍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4

字 数 237,000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42-0/D·3206

定 价 68.00 元

本书获得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

谨以此书缅怀

S.N.艾森施塔特(1923—2010 年)

塞缪尔·P.亨廷顿(1927—2008 年)

作者简介*

施蕴玲 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最近的作品是与卡辛·特贾皮拉(Kasian Tejapira)共同编著的《旅途中的建国者：现代东南亚建设历程中的跨国流动与跨国运动》。

彼得·J.卡赞斯坦 美国康奈尔大学小沃尔特·S.卡彭特国际研究教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安全与文化。

石之瑜 台湾大学教授，教授文化研究、中国研究和政治心理学。已在中国民族政治、社会改革、乡村民主、外交政策和亚洲主义等领域发表诸多研究成果，《亚洲族群研究》编委。目前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研究的比较认识论。

白石隆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展经济体系研究所所长，日本内阁府科技政策委员会执委。

朱天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教学与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发展政治经济学。

* 艾伦·卡尔森和徐昕分别为本书英文版贡献《边疆再设想：中国化模式与中国边疆新思维的兴起》和《一个中国、两个世界：身份与安全追求》这两篇文章，在此特别表示感谢。艾伦·卡尔森，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副教授，著有《统一中国，融入世界》（2005年），参编《当代中国政治》（2010年）；徐昕，康奈尔大学中国与亚太演技项目部主任，政府系助理副教授。

前言

本书是世界政治文明研究的三卷本丛书之一。第一卷《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2010年)强调文明的多元性与多维主义，并以之为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用于六大文明研究。随后出版的两卷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文明进程和文明身份研究。《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2012年)分析了中国和平崛起时代的中国化过程。《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2012年)分析了英美文明身份的演变，特别关注了自由主义与种族之间的问题。《世界政治中的文明》为这套三卷本文明系列丛书奠定了概念基础，第二卷和第三卷均在最后一章的第一部分对此概念体系进行了大体相似的复述。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副标题传达了这两本书的同一个核心思想，即我们需要超越把世界绝对地划分为东方与西方的做法。

文明三卷本丛书的思想灵感来源于我在过去20年里曲折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我曾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规范与身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我在一本书中研究了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理论，并将这个理论运用到另外一本书中，研究了日本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年里，我还思考过世界政治中的地区主义与地区化问题。但是，我始终不太满意自己对于东亚和西欧地区身份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历史上的一幅幅地图生动地表明,地区身份如何发生着演化,世界在人们的想象中如何不断地被重塑。地区的边界与地区的意义都是开放的,总是能引发政治辩论和冲突。就边界和意义而言,地区与文明何其相似。我希望关于文明政治的阐述能以一种更令人信服的方式,更准确地把握到那种政治脉搏。

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文明层面的分析加入国际关系的常规理论中。文明三卷本丛书试图进一步明确世界政治的文明背景,重点研究中国化和英美文明,以这两个例子来展现通常被纳入全球化和国际化评价体系中的复杂过程和受争议的身份。尽管全球化与国际化指涉的对象不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全球化描述的是超越时间、压缩空间的过程,对于世界政治具有创新和改造的作用。国际化指基于领土、跨越国界的交换,反映的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延续与演变。全球化崇尚围绕共同标准的融合,以及各种应对全球变化的本土适应性工作。国际化允许在各民族的实践中继续存在民族差异。因此,当代世界政治是改造性全球效应与累积性国际效应的混合体,这两种效应塑造和重塑着国际体系。

聚焦文明进程和文明身份使我们可以脱离一般性分析,更为具体地勾画特定的全球和国际背景,从而说明文明间接触和交往的独特特征,以及偶发的文明冲突的特殊性。背景特性(contextual specificity)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现有理论告诉我们的是一般层面上的规律,无助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或接触。文明三卷本丛书并不是要就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文明转向的具体主张。我们试图发现规律,而不是提出具体问题、特定条件,或者提出替代性的解释和有助于定量研究的指标。我希望能勾画世界政治的宽泛轮廓并提供创新的视角,以便其他学者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自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文章以来,他的文明冲突论一直是我在康奈尔大学讲授的“国际关系导论”这门大课的必读材料。那篇文章为历届学生所喜爱,在我布置给学生的近50篇阅读材料中通常位列最受欢迎的三篇文章之一。十年前,我开始对宗教与世界政治的关系感兴趣,研究宗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那时我偶然读到了史缪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在某些方面,多重现代性能够矫正文明冲突论;而另外一些方面,它又是文明冲突论的补充。最后,几年前,我开设了一门新课,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重读了亨廷顿关于美国的大量著述,认识到他的美国观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观点相近,与文明冲突论也是一脉相承的。我还发现,艾森施塔特的多重现代性概念与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的多重传统批判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史密斯对哈茨(和亨廷顿)秉持的美国自由传统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以不同于这些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及其同类国家,可能会收获颇丰。美国不仅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全球市场上资本主义民主的领导者;美国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文明。

与其他任何著作一样,这套文明三卷本丛书也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如果说最初推动这个研究项目的是亨廷顿的文化现实主义,那么最终自由国际主义的局限性成了我的核心关切。和文化现实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者至今依然遵循世界政治的欧洲中心模式,这一模式建立于19世纪,而今早已过时。和今天一样,那时的文明国家或曰发达国家为不文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制定标准。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迫使我专门就世界政治种族层面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纳粹德国,被美国士兵解放,正因为许许多多美国士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才得以自由地生活。因此,种族对我而言曾是一个充满了大屠杀暗示的课题,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我一直予以回避。美国慷慨地收养了我,我也完全地投入到她的怀抱,我深深地崇敬美国,深深地被她吸引,这种感情使得我过去一直掩饰美国存在的问题和丑陋的方面。

尽管当着我这个德裔美国人的面,我的东亚同事们出于礼貌淡化了这个事实,但是多年来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认为在任何严肃的世界政治研究中,种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很早就意识到,我那些做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同事对于自由主义与种族关系的研究或是毫无兴趣,或是公开持有敌意。当然可以说,他们所处的社会仍然带有显而易见的、永远忘不掉的丑陋的种族主义疤痕;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在这个多重文化主义与人权的时代,自由主义与种族的关系不是问题。自由主义学者将威尔逊主义进行了改造,使其基本政策取向适用于我们的时代。而现实主义学者则批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不切实际、过于理想主义,试图减弱他对世界政治的深远影响。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没有花上哪怕是片刻的时间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来自南方的自由主义者威尔逊也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因此,在这套三卷本的结语部分,我研究了英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走向全球过程中的异同,探讨了国际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努力寻找可类比的历史案例,期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场我称之为“多形态全球主义”(polymorphic globalism)的运动。尽管全球主义在内涵上与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它的意义更为深远,它面对的不仅是西方或英美世界,而是范围更为广阔、形态更为多样的人文世界。

我最终发现,我对文明研究的兴趣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甚至是过度质疑。尤其是那些对现代世界的文明研究感兴趣的人,他们背负了太沉重的欧洲中心的种族主义负担,因而本能地回避了文明的概念。虽然他们对我的主要观点往往都是认同的,但是他们问得最执着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呢?”换一个负面联想少一点的概念或术语不好吗?后来我对这个问题准备了两个答案。

首先,我愿意和这些批评者打个赌。他们应该找些报纸,做适当取样,对报纸头版进行内容分析,数数他们个人或者他们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出现在头版的次数,与报纸头版援引“东方”和“西方”的次数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和我打这个赌。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文明概念在日常用语中无所不在。其次,我会提到上文说过的康奈尔大学本科生的阅读偏好。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学者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公共话语的讨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是躲在各种新造的术语后面,不理睬学生的观点。

国际关系学者对我的研究持不同态度。现实主义者只是耸耸肩,不置可否。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的文化研究当然不感兴趣,认为亨廷顿的理论已经被证实是错的了,尘埃落定。冲突大多发生在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这种观点忽视了亨廷顿最大的学术贡献,他警告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冷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由主义者很难接受我的观点。他们坚持说,良治的普适标准根植于自由主义原则,但我认为这与19世纪的文明研究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极其相似,令人担忧。国际自由主义视域狭隘,不足以包容新兴世界秩序中的所有规范议程。

本卷重点研究中国化进程,探讨中国崛起的重大政治意义,及其引发的安全、经济和文化问题。我们采用过程和机制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倾向于采用结构模型。因为结构大多是缓慢的运动过程,所以采用过程和机制分析方法来仔细剖析诸如中国化的进程也许更为适宜。本书从政治实践视角,通过行动和话语分析来研究文明进程,无需预设立场,也没有必要依赖先验的选择。习惯于结构和战略思维的国际关系学者也许会认为书中的某些概念和语言有些生僻,甚至难以理解。但是对于文明研究学者来说,这些概念和语言来源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再恰当不过的。

编著《中国化与中国崛起》一书的想法主要源于我对东亚长时期的研究兴趣。多年以来,我的一生挚爱和伴侣玛丽(Mary)为我提供了精神营养(和印度晚餐),助我前行。东亚研究所的资助使我得以于2008年4月到东亚进行学术之旅,并在首尔、台北、东京、上海和北京的研讨会上讨论初步的研究论文。感谢东亚研究所和上述研讨会的与会者,使我在本项目的启动阶段就获得了交流研讨的极好机会,得到大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2010年1月,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本书的作者研讨会,2011年3月还是在北京大学,我们又就此项目召开了一个更大范围的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讨论了我和参与本项目的同事们提交的研究设想、研究提纲和比较完善的论文初稿,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感谢朱天飏(Tianbiao Zhu)教授和杜维明(Wei-ming Tu)教授主办这两次会议并提供部分经费支持。此外,两次会议的大部分经费由康奈尔大学小沃尔特·S.卡彭特国际研究教授教授经费支出。

衷心感谢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为我提供的2009—2010年度路易斯和约翰·斯蒂芬斯创始人会员访学项目。对我而言,那一年至关重要。我得以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进一步完善我这套文明三部曲,并阅读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在不同的方向上指引着我,使我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各位作者,其中既有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刚刚结交的好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无论在“前言”或是“致谢”中都难以全面表达。他们提出的很多想法和建议,对我文章初稿的意见,以及他们自己所撰写的文章,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两本书所研究的主题的了解,加深了我对于世界政治中很多我尚未明白,甚至以前完全没有思考过的一些问题的理解。并肩工作,其乐无穷。当我们像梅尔维尔笔下的漫游水手伊什梅尔(Ishmael)一样踏上新的征程,寻找新的货船和同伴时,我会怀念我们的讨论。这两部书也再次让我认识到,创造新知识是一个美妙的过程,它既是社会

性的，又是孤独的。

谨以此书缅怀史繆尔·艾森施塔特先生和塞繆尔·亨廷顿先生。我从这两位了不起的文明研究学者身上受益良多，特别是体会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文明的分歧对于学者来说是学术生命之盐，不可或缺。

彼得·J.卡赞斯坦

纽约伊萨卡

2011年7月

目 录

作者简介 / I

前言 / II

第一章 中国崛起：断裂、回归、重组？ /1

彼得·J.卡赞斯坦

第一篇

第二章 中国崛起：压缩式发展、灵活实践与多元传统 /53

朱天飏

第三章 中国崛起及其对东亚的启示 /80

白石隆

第二篇

第四章 四位海外移民学者的文化中国化 /119

石之瑜

第五章 成为东南亚“华人” /150

施蕴玲

第三篇

第六章 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化 /191

彼得·J.卡赞斯坦

参考文献 /232

第一章

中国崛起：断裂、回归、重组？¹

彼得·J.卡赞斯坦

近几十年来，所有经历过崛起与繁荣的国家都迅速陷入失落，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20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日本曾有过短暂的欣喜陶醉，以为本国的制度模式可以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美国也曾有过同样的迷梦，持续的时间比德国和日本还要长得多。不过，美国的榜样梦想也破灭了。这是由于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第一任期之初，美国的外交战略政策遭到挫败，随后在布什第二任期快结束时，美国不受监管的金融体系又遭遇了灾难性崩溃。德国模式论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德国整整十年痛苦的结构调整而受到重大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因德国国家统一成本巨大而走低，在21世纪的头十年则因其政治经济调整而成为一种需要。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以及之后，德国经济虽然表现强劲，但德国模式论却没有再度兴起。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雄心抱负遭遇挫折，而今天的中国可能会遇到同样的挑战。²过去，人们对新兴崛起的日本、德国，甚至美国有些恐慌过度，今后对于中国崛起他们可能也会同样恐慌。当代世界政治形势发展变化之快，导致其结果常常出人意料，因此人们不能对世界政治作出或乐观或悲观的单方向的简单化预测。

几十年前日本的情况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崛起具有直接相关意义。³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显著崛起，无论是在国际事务中，还是在书籍封面上，人们总能看到日本的身影。日本的新科技实力为其商业扩张和崛起提供了动力，使之崛起成为一个新型的文人政权大国。1985年，日本币值调整，使其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和亚洲主要投资来源国。日本调整其产业政策模式，开始致力于打造亚洲区域基础设施，以使日本及其亚洲伙伴共同获益。⁴日本的权力并没有嵌入某些正式的机制安排当中，而是建立在去中心化的网络架构之上。⁵日本腾飞及之后的飞速发展似乎产生了足够动力，可以拉动整个亚洲的发展。然而，由于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同时破裂，日本经济发展戛然而止。日本与其亚洲伙伴不得不调整自我定位和发展目标。网络架构重新调整，新的网络节点出现，旧的节点自我更新，网络中的一些联系完全断裂。亚洲的区域发展并没有为其他地方提供一个模式，而是从日本发展模式走出来，超越了日本。⁶但这并不是说日本经历了断崖式衰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年的经济停滞之后，日本人均收入仍高达4.2万美元，同期美国人均收入为4.7万美元，中国为0.43万美元。⁷但是，亚洲发展并没有围绕日本而实现。日本化过程是多向的，而非单向的。日本人希望通过日本化让亚洲变得更像日本，但这并非日本化的唯一内容，日本化还意味着让日本更像亚洲，或者更大范围的世界。日本希望破灭，其主要原因是对权力理解不够完整，从而产生失望情绪，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日本民众和政治层面。

在中国，人们常常将中国崛起和中国化过程称为复兴或振兴。分析中国崛起及中国化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对权力概念有一个全面理解。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认为，权力具有直接目的指向性，以具体和可观测的方式行使并产生行为效果，这些都是重要的权力属性，但并非权力的全部内容。同样重要的是，权力还可以产生非行为后果，这时权力没有